

民间文学

在科技昌明的今天 我们聊聊“仙话”

□岳永逸

在对汗牛充栋的仙话进行系统学术研究的同时,严优更希望能对大众进行关于仙话的知识普及。一反百年前启蒙先驱的否定性基本定位,有着文化自信的严优旗帜鲜明地指出:“神仙学说及仙话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一份别致的礼物”;通过具有突出的“中国性”的仙话,完全可以讲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因此,“对传统文明进行现代化的审视与扬弃,并且不断将这种审视与扬弃的成果与本文明的后裔们分享”,就成为严优创作《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的强大内驱力。

何为仙话?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经由与神话的比较,严优将仙话定义为“基于人们相当长时期内相当程度共识的、关于仙的故事的总和”。然而,我更欣赏她在对“监察神”——三尸神的品评中似乎是不经意地写的那句:“仙话提供克服一切障碍超越自我的可能性”。应该说,这一句是关于仙话最言简意赅且直击内核的定义,也是严优基于对个体生命的敬意、基于人间本位主义,赋予仙话以“正”能量,进而赋予《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合理性的基石。

易言之,仙话并非仅是有角色、有情节、有共识的关于神仙林林总总、源远流长的故事。这些长命不绝衰的故事,之所以在自古及今的中华文明体中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在科技昌明的今天还要讲述、重温,关键就在于它是生命观的投射,是对人突破自身局限性的一种朴素而奇妙的想象,或如汪洋恣肆,或如小溪潺潺,或如瀑布飞流,或如泉水叮咚。而且,它也确实在相当意义上表明了人克服一切障碍而超越自我的可能性。作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文类,仙话有着人类优秀文艺作品基本的形态、质地与功能。因为它直面的是最普遍意义和最本质意义上的个体本身,面对的是人心与人性,映射的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对生命的

理解、期许和从未停止的如夸父逐日般的苦苦追寻。

当然,要说清仙话,就不得不说清“仙”。与禄是道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传教士整体上倨傲、笼统地将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视为“异端”、污名化为“迷信”不同,20世纪后半叶基于田野调查的焦大武、武雅士等人类学家,对中国本土宗教提出“神—鬼—祖先”的三极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虽然有所进步,但“神”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几乎囊括了除鬼之外人们供奉膜拜的一切超自然力量,神、仙、精、灵、怪等等。在汉语语境中,“神”“神仙”“仙”之语义多相含混。三个语词中,最常用的是双音节的偏义复词“神仙”。不同语境下,“神仙”或指“神”,或指“仙”。

何为仙?它是通过内养外服等方式修炼而长生不死,经常住在山里或其他奇境之中,具有某些特殊能力的得道者。仙是后天的,是凡人经过艰苦修炼得成,其“仙格”由“人格”提升而来,其超自然性由自然性改造而来。显然,与神相较,仙与人有着更多的互动、关联和亲缘性,是凡人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信奉、实践的奉神为人和奉人为神的“神人一体”辩证法的绝佳体现。

因此,鉴于“仙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在架构上分成了围绕“仙”和“话”的上、下两编。同时,也因为仙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仙在话中”和“话中说仙”的《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又成为一个整体的“纪”。这个纪,不仅仅是“录”,也是“述”。

与郑土有等前辈相对严肃的学术写作不同,严优明确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轻学术”——有游戏精神,轻松活泼又不乏棱角、锋芒的学术写作。也即,她要一如既往地在学术语言与普通读者的通俗阅读需求之间架起桥梁。顺势,严优将其写作与古已有之的文体“笔记”区分开来,命名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笔记”。较之古代的笔记体著述,其当下性的笔记不仅仅是如张岱《夜航船》般的记与言,而是更有体系、更注重论与辨,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较之学术专著,其当下性的笔记又有着更多的弹

性与回旋的空间。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联想、随兴发挥,使之有着更多的本色与真情。

如是,在作家和学者之间的自由摆渡、切换与穿越,使得貌似调侃却严肃认真、直捣黄龙的“轻”说,既是《诸仙纪》的内核,也常让人脑洞大开,会心领首,抿嘴一笑。诸如天上玉皇名号得来的全不费功夫,人间“龙王”的捉襟见肘、装神弄鬼、装疯卖傻,皆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在其“轻”说之中,道貌岸然、相互含括、狼狈为奸的神权、皇权、男权没有了遮羞布,赤身裸体,一览无余。

当用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技术、物象来勾画仙家时,高流量的神仙之画皮也欲盖弥彰。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实现了时空穿越,而是读者在文字前反转、倒立,俨然梦蝶的庄周,是耶非耶,满眼的迷离蒙眬,心与物游,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在严优笔下,灶王爷,是老天爷投放到世间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且自带超大硬盘,整年全天候不间断存储你的黑料;三尸神,作为监察界的劳模、间谍界的王牌,对你的监察是钻进你的肉身的内部监控。

毫无疑问,这样的“仙话”——对神仙的唠嗑、比划,绝对前所未有的。其实,严优以其不显山露水的曲笔,描绘出了当代以科技形态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神仙”。她不仅描绘出古人的生存困境和突围的尝试,也不经意地在其游戏文字中道出貌似“不信一切”的现代人生活的两难,和算计重重,处处设防,监视又“全景敞视”,以致荷载独彷徨而无险可守、无围可突的窘境。

当然,这一技术世界困境的揭示,仅仅是无心插柳。以其女性的细腻与敏锐,严优对仙话的当下的纪与述——现代释读,更着力女性主义立场。她试图通过其“仙话”,为过往仙话中受歧视、压抑,甚或奴役的女性(神仙)鼓与呼,从而赋予古旧仙话以当下性和启蒙性,进而实现对仙话这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换。

(摘选自《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标题为编者所加)



浙江文艺出版社
张丽娟译
〔日〕小津安二郎著
野田高梧著

生命的境界

□曲树强

文学翻译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优秀的翻译作品,既要忠实原著,力求翻译准确无误,也要保持原著的写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从而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而翻译的艺术水平与译者的艺术修养息息相关。从张丽娟翻译的小津安二郎的四部经典之作《晚春》《东京物语》《彼岸花》《秋刀鱼之味》,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译者对原著的深刻理解、对作者的深度了解以及对生命的诸多感悟。

张丽娟翻译的这四部剧作始于2019年12月,次年10月翻译完成,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尽管在出版过程中费尽周折,但雨后总会见彩虹,译作如今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正像译作《晚春》所寓意的那样:春天再晚都会来。

在着手翻译作品的2019年年初,张丽娟刚做了一场大手术,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身体恢复尚需时日,她便开始了翻译工作。其间,困扰她多年的偏头痛频繁发作,疼痛加剧,再加上颈椎椎管狭窄导致的大脑供血不足,她经常处在头晕目眩的状态。然而,怀着对作家和作品的满腔热爱,怀着对文学翻译的挚爱,她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抓紧工作。这是一次挑战自我的过程,往往为一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她都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然而收获也是颇多的。她说: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常快乐的,尤其这件事情恰好是自己喜欢的,幸福感更是满溢。

也许生病之后,让张丽娟这位70后译者对人生有了更加透彻的感悟,对原著作品的理解也尤为深刻:她从《晚春》中感悟到“春天再晚都会来,春天再长也会去”;从《彼岸花》中看到“生命轮回不休,彼岸花开绚烂”;从《秋刀鱼之味》中她领悟到“且行且珍惜”;从《东京物语》中她体悟到生命的意义与终极的孤独……

通过对作者的了解,她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灵魂:小津安二郎,这位伟大的导演和剧作家,他的生平也可以与他的电影相提并论。这是一位热爱喝酒与美食的人,一辈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没有结过婚,《秋刀鱼之味》是他去世前最后执导的作品。1963年12月12日,恰恰在60岁诞辰之日,他安然离去,按照他的遗愿,墓碑上只留下一个字——无。这个字,诠释了他对人生的体悟,彰显了他生命的境界。

作家的人生轨迹和人格魅力以及对艺术的态度,还有透过作品让人领悟到的生活的时而宁静、时而澎湃,都深深感染着译者。翻译过程中,作品中那些关于生命的感悟与思考,让作者的心灵经历着一次次纯净的洗礼与超越,那些字句通过心灵的领悟再次以另一种语言传播给更多的读者。译者如一叶小舟,在作品主人公喜怒哀乐的情感海洋中沉浮,她努力地去接近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在力求准确翻译的同时,更注重追求语言的流畅与质感。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四部充满生活气息的译著,读到了关于生活、关于生命和命运的诸多体会和彻悟,也从作家、译著和译者的三位一体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境界。

社会科学

“垃圾之战”当怎么打

□几又

只要有人类足迹所至的地方,就会有垃圾,无论是遥远而又偏僻的乡村,还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人类学博士、《垃圾之战:废弃物的绿色治理、科技争议与环保行动》作者张勘颖从2008年开始调研我国垃圾治理问题。其间,他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从近年来邻避效应的焦点垃圾发电站选址出发,一路透视垃圾处理、分类以及商品制造等全过程,试图再理解废弃物,将废弃物视为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国家、市场、科学、技术、普通消费者、环保行动者等多个行动者共同生产、竞争、建构其意义。

垃圾问题由来以久,但什么是垃圾,却很值得我们反思。在张勘颖看来,当人们越来越被消费文化牵着牛鼻子走时,不自觉地会抛弃艰苦朴素传统。艰苦奋斗意味的不仅仅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还意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的产量。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晓,时光往回二十年前,我们还极力倡导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可时至今日,我们常常因为衣服旧、过时、不喜欢等原因选择抛弃。那时垃圾并不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至少农村的垃圾大都可以通过化粪池转化为肥料加以利用。

西方有句谚语,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垃圾是否变废为宝关键取决于一个“变”字。我国曾一度是“洋垃圾”的倾销对象,汕头贵屿还形成了电子垃圾拆卸分解再回收的重要基地。但垃圾回收成本高,特别是环境污染压力极大,正因如此,2018年我国发布“洋垃圾”进口禁令。颇为吊诡的是,口号声称垃圾为宝贝的发达国家不是变废为宝,而是在指责我国新政同时,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倾销对象。

张勘颖指出,“垃圾治理如果不是前瞻性的,就必须是滞后的”。所谓前瞻性,就是从产品设计、制造、包装等全过程,尽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特别是不可降解垃圾的产量。滞后则是对已经形成的垃圾分类回收,对不可回收垃圾采取无害化处理。为此张勘颖深入到力推垃圾分类城市,在社区楼栋内观察分类措施的落实。

许多人一方面感叹近邻日本垃圾分类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对于身边的垃圾分类却视而不见。就此问题,张勘颖适时导入自己的专业知

识指出,“经济人类学家认为,人们如果想要接受和践行一种新的知识实践,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上有动力:道德的动机、社会—政治的压力,以及物质或经济的激励”。

道德本质上是教化,即全民式的垃圾分类教育。从一些城市率先推行的垃圾分类来看,分类还是有关一定的“技术”门槛,如果没有广泛的教育很难达成效果。日本首都东京“垃圾分类手册”就有30页,一共列了500多项条款。而“社会—政治的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视为社会秩序基础,即法律法规。那些垃圾分类越是出色的国家,立法越是完善。从这层意义上讲,垃圾分类不仅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规范对象。至于张勘颖导入的第三个维度“物质或经济的激励”就更容易理解了,对于企业可能是环保补贴,对于个人则可能变成物质激励。当然三管齐下也未必可以立竿见影。欲速则不达,日本垃圾分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循序渐进与持之以恒才可能有所成效。

打赢“垃圾之战”,也不能忘了农村。为此,张勘颖指出,“唯有城乡统筹考虑,才能真正走上生态环保和环境正义之路”。一言以蔽之,如果不尽早着手,本来可以“前瞻”解决的农村垃圾问题,很可能拖成“滞后”了。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